

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刁 莉 唐 倩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随着汉口镇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武汉与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武汉棉业贸易格局在外力冲击下开始重塑。早期工业化的推进使武汉地区棉业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发生了系列变革,在进行技术改良创新后,棉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逐渐建立起了完整的供求体系,在近代武汉地区呈现了早期工业化之后的本土化升级,由原始的乡村纺纱织布一体变为了城乡市场供需双向驱动的精细分工,即乡村植棉、城市纺纱、乡村织布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乡村土布利用机纱改良升级,进一步拓宽了销售市场。在武汉棉业的发展过程中,地理位置、本土商人、原料和技术的革新发挥了巨大作用。近代武汉棉业本土化改良后,还形成了早期的产业链。武汉位于长江内航中心,对于近代市场的内贸起着非常重要的“二传手”作用,是新旧事物的交接与汇合之处。通过对棉纺织这一产业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洋货贸易的冲击下,武汉作为一个近代次商业中心和内陆航运枢纽,拥有着十分强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城乡供需双向驱动 棉业贸易 棉业发展

近代棉业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但从产品构成来看,主要包括棉花、棉纱、棉布等制成品。本文的棉业主要指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这三个过程。19世纪90年代,汉口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岳州、宜昌、沙市、重庆等城市相继开埠,列强对内地的商品倾销愈演愈烈,汉口成为洋货输入内地的重地。同时,国内长江航运业兴起、京汉铁路开通,交通的便利使汉口成为内地土货输出的窗口。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汉口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紧密,汉口的棉货贸易成规模化增长态势。汉口承担着棉货贸易集散地的功能,大型现代化纱厂基本设立于武昌地区,而汉阳、阳逻、黄陂等地的土布业十分兴旺。由于棉业包括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因此本文的研究区域为包括武昌、汉口、汉阳及附近乡镇在内的整个武汉地区。本文选取1893—1937年作为研究时段,原因在于1893年是张之洞创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正式投产的时间,象征着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开端,而1937年则是抗日战争波及武汉前,棉纺织业正常发展的最后一年。之后武汉棉纺织企业被迫西迁,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就此中断。为了保证研究的连贯性,文章未涉及抗战结束后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

在外贸冲击的不利环境下,武汉的传统棉纺织产品市场曾一度被洋货挤占,农村手工纺织濒临绝迹。但随后武汉的棉业产品不但迅速扭转了洋货全面侵占市场的局面,本土传统棉业也获得了成功转型,使改良版的土货迅速流通到华中地区及长江上游地区。武汉棉业为什么会在列强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①中,实现变革,成功转型?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本文认为武汉的中心地理位置、本地商人的利益需求和技术扩散效应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刁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430072,邮箱:fxyd39@126.com。唐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ZD236)支持。向匿名审稿专家致谢。

① 国际垂直分工体系,是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

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从全国角度对棉业进行整体研究,如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彭南生等认为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棉织业的发展,机纱的引入提高了手织布的效率,林刚、于新娟等学者对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的棉业进行了详细研究,但对武汉的专门研究则较少。^①关于武汉地区的棉纺织业,以植棉、棉纱或棉布其中之一为主,且主要集中于几家大型纱厂。^②较少有涉及武汉棉业的整体性研究,少数研究对湖北省棉业做了详细梳理、总结,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制度的角度出发,^③对于城乡之间的商品贸易、市场供需、产业联动缺少更深入的分析。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清末民初武汉的棉业贸易与发展情况,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中江汉关棉货进出口贸易的数据,梳理武汉棉业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通过对比开埠前后武汉及其周围地区的棉业生产及销售状况,厘清近代武汉棉业产业改造升级的发展脉络,总结棉业发展的特点;从城市与乡村市场供求双向驱动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本地商人在棉业技术进步、产业链的完善与延伸方面的作用。

一、近代武汉的棉业贸易

武汉是华中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具有非常广阔的贸易腹地,吸引了大量棉货来此交易。通过当时的海关贸易数据我们可以了解棉花、棉纱、棉布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态势。

“棉花市场,亦因季节而开,最盛之时,每日民船数百,积载棉花,集合于此。”^④汉口实际上网罗了湖北省的全部棉花,由平汉路来的豫、陕、晋棉花,由汉水来的陕棉,以及由洞庭湖、粤汉路来的湘棉,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棉花市。^⑤但其市场地位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由旧海关资料统计的数据可以观察到武汉棉花进出口贸易的变化趋势,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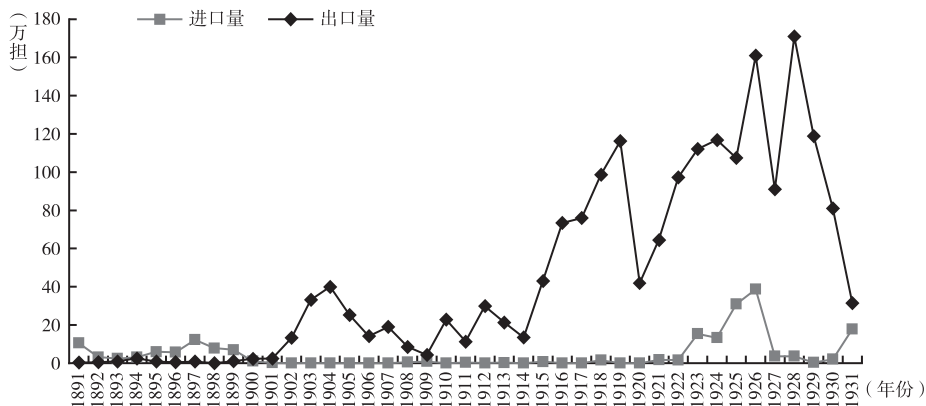


图1 1891—1931年江汉关棉花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0—111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内容整理。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彭南生:《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于新娟:《民初至抗战前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贸易态势——以海关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林刚:《农民家庭工业对现代工业的影响问题》,《近代中国》2009年第1期。

② 有关成果参见徐凯希:《近代湖北植棉业初探》,《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姜锋:《略论旧中国裕大华资本集团》,《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姚会元:《“裕大华”及其经营管理》,《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罗萍:《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罗萍:《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919—1937)》,《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

③ 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印行,第41页。

⑤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401页。

综观 1891—1931 年武汉棉花进出口变动情况,可以按照变化幅度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 1900 年以前、1900—1919 年和 1920—1931 年。在第一阶段,武汉棉花进出口的变化态势差异明显,基本上是进口大于出口,且出口量变动幅度极小而进口量变动幅度较大。在第二阶段,棉花进口继续低迷,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出口波动幅度却比较大,先是出现较大增长然后回落,1915 年开始又出现了第二轮增长,且一举增加数倍,1919 年前后却再次回落。第三阶段,武汉棉花进出口变化态势则大体相似,都是先增长后下降,而且变动幅度非常大,就连峰值出现的时间也大致相同。总体来看,武汉的棉花出口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且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达到顶峰,进口量则长期稳定在低水平。

武汉棉花进出口态势的变化,可以从当时国内外棉纺织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中找到解释。1891—1900 年是国内棉纺织工业的起步阶段,武汉在此期间建立起了最早的棉纺织企业——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而当时湖北出产的棉花数量不多、品质较次,因此武汉要进口一定的棉花来满足纱布官局的生产需要,而且 1893—1897 年纱布官局生产情况尚可,棉花进口量也就有所增加,但 1898 年后织布官局、纺纱官局开始减产、停工,武汉棉花进口自然也随之陷入停滞。不过,当时国内外棉纺织工业整体向前发展的势头没有改变,在棉花市场需求增加和张之洞改革的双重推动下,湖北植棉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所产棉花除供本地企业使用外还有大量剩余流入市场,于是棉花开始成为汉口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的纺织工业因此受到影响,日本和中国的棉纺织工业趁机崛起,同样需要大量棉花,这促使武汉的棉花输出迅速增长。因此,1900—1919 年间武汉的棉花进口基本没有变化,而出口却大幅增长。1919 年以后,武汉的棉纺织工业开始蓬勃发展,本地纱厂大多于此时开工生产,消耗了一部分湖北棉花,导致棉花的出口量短暂下降,后来随着湖北棉花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武汉棉花的出口量也继续增长。

棉纱是棉花与棉布的中间产品,是织布的直接原料。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棉纱就成为了武汉进口的大宗商品,在武汉对外贸易加速发展后,棉纱进口也随之快速增加;一战后随着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勃兴,武汉的棉纱进口量有所减少,出口量增加。图 2 展示了 1891—1931 年武汉棉纱进出口情况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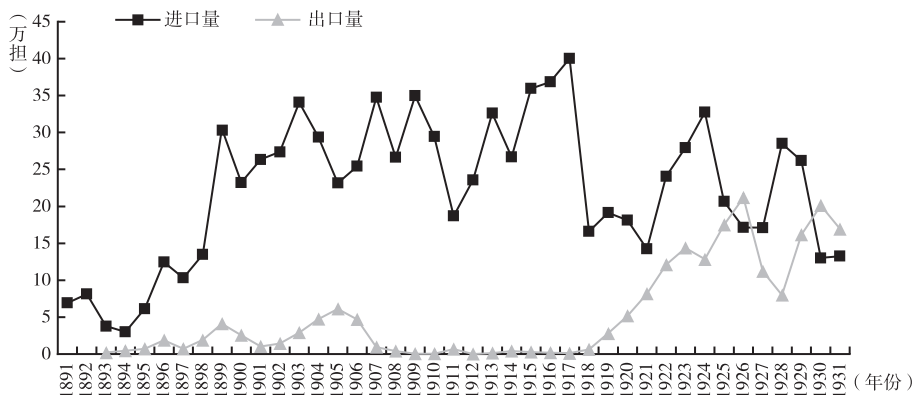


图 2 1891—1931 年江汉关棉纱进出口数量

资料来源: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第 20—111 册相关内容整理。

与进口态势相比,1891—1931 年的武汉棉纱出口在前期较为平稳,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中间有一段时间陷入沉寂,后期则开始爆发。从 1893 年开始首次有棉纱出口,但数额极小,仅有 2000 担左右,之后虽有所增加,在一战前出口最多的一年仅 6 万担左右,与进口数量相去甚远,1907—1918 年的出

口数量更是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从1919年开始,出口量迅速增加,从1918年的6000余担增长到了1926年的21.2万担,甚至一度超过了棉纱进口量。之后出口量虽然有短暂的下降,但在1930年又重新回到了20万担以上,并再次超过了进口量。

从棉纱进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到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的一些脉络。1893—1899年是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运营的时间,但武汉从外地进口的棉纱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加,说明这段时间是从事棉纱经销的商号扩大经营的时期,武汉市场对于机纺纱的需求迅速增加,但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的生产能力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1899年左右,武汉棉纱需求渐渐达到饱和,之后一段时间进口没有再大幅度的增加,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出口量则从1902年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说明这段时间武汉棉纺织工业有了进步。1914—1917年武汉棉纱进口量有所突破,说明市场需求再一次扩大,这段时间的出口量没有增加,应该是因为武汉棉纱主要行销于国内。1918年进口量下降而出口量迅速增长,说明随着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本地棉纱不仅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且有能力向外拓展,武汉棉纱逐渐开始参与到与外来棉纱的竞争之中。

棉布是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棉纱交编而成,^①纵贯的棉纱即为经纱,横穿的棉纱即为纬纱。棉布种类繁多,幅度、长度和重量都有所不同,计量单位也多种多样,出于数据的统一性和可得性,本文选择对棉布的进出口额进行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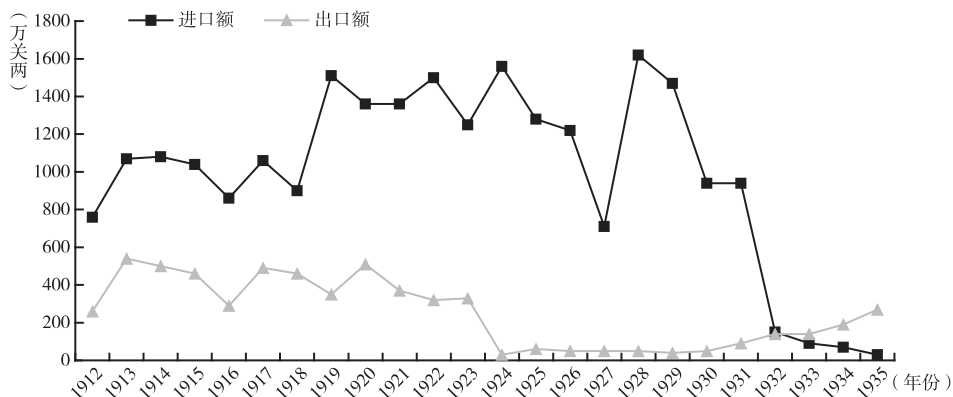


图3 1912—1935年汉口棉布进出口额

资料来源:据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相关内容整理,出口值引自第130页,进口值引自第167页。

对比进出口额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武汉棉布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大额入超状态,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随着棉布进口量的大幅减少逐渐转为出超。民国初年武汉棉布出口较少,1912年出口额为260万关两,后来逐渐上升,但出口额仍远不及进口额,1920年出口额为510万关两,1923年之后开始下降,到1930年已回落至50万关两。^②长期的入超说明,民国时期洋布在武汉市场的倾销取得了成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可以称得上是武汉洋布销售的黄金时期。而1930年以后进出口状态的逆转源于棉布进口的衰落而非本地棉布出口的增加,这说明武汉洋布倾销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市场衰退,本地所产棉布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高。

棉花、棉纱、棉布是棉业的三种主要商品,从汉口江汉关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态势可以看出武汉的棉业发展趋势:植棉业的逐渐兴盛、棉纱的进口替代和洋布在市场上的衰退。

①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3页。

②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129页。

二、近代武汉棉业市场城乡供需双向驱动的形成

近代武汉棉业的发展与贸易息息相关,城市工厂的棉纺织业与广大乡镇腹地的棉业相辅相成,两者的联动发展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变化,进而产生了新的供需驱动力。

(一)开埠前武汉地区的棉业

19世纪末,除黄州府黄梅县等山区因山多田少,当地农民以种棉为主要生产活动外,湖北其余地区种棉均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并不对外出售。^①农户在农忙之余从事手工纺纱,生产工具主要为竹木结构的手摇纺纱车,^②手工纺纱的效率很低,数日纺纱所得才能满足一天的织布所需。历史上,德安府应城县“男女恒纺木棉花,为粗布,贸之四方”;^③随州“随地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持此为生计”;^④天门“为农者必兼织,广植木棉,农隙即率妇子昼夜纺绩”;^⑤等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发现,乡村手工纺织业与植棉业紧密联系,同步发展,构成了湖北农村家庭棉业的基本生产链。在传统棉业中,植棉、纺纱、织布联系紧密,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可以在小农家庭内部一体完成。

随着乡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湖北一些棉纺织业专业市镇逐渐兴起,为棉纺织个体生产者、花纱布牙行和外来客商提供交易场所。明清时期湖北的纺织业市镇共有12个:龙坪镇、武穴镇、车湾市、朱家河镇、董市、河溶镇、长江埠、汉口镇、索河集、蔡店镇、永安保集、童庄。^⑥其中,黄州府广济县的龙坪镇、武穴镇是棉花种植和贸易专业市镇,广济县所产棉花,“以龙、武两镇为佳”。^⑦监利县所属车湾市、朱家河镇以纺织业著称于世,“所产吉贝、大布,西走蜀黔,南走百粤,厥利甚饶”。^⑧枝江县的董市是附近乡村棉花、棉纺织品输往四川的专业市场,“居民于农毕时,纺织兼营。……贾人多于董市汉口买花入川,呼为楚棉,布亦如之”。^⑨汉阳县之索河集是棉布贸易专业市镇,“平时,则收买白布,转贩汉镇”。^⑩汉口镇不仅是两湖地区棉花运销的中心市场,其本身也具有规模经营的棉布加工业,是各类棉布的交易中心。1840年前后,汉口出现了白布街、花布街等土布集中交易场所,^⑪棉布行是汉口镇贸易额最大的六大商行之一,“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⑫

开埠前,专业市镇的原棉供给、布匹货源主要来自附近的乡村。棉花、棉布等棉产品从农户到最终消费者的手中,需要先经过专业市镇等中间市场,再运往转运市场,最终才能到达消费市场。汉口附近的武昌、江夏、汉阳、黄陂、孝感、黄州、天门等地乡民所生产的土布多由小贩在农村零星收买,集齐一定数量后再统一包装分类卖给汉口的布行,布行再派专人鉴定成色,根据品质优劣和购买偏好分类输送各地进行销售。^⑬由汉口转运的土布,销售范围十分广阔,不仅包括湖北本省,还辐射陕西、湖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距离较远的省份,甚至远达两广之地,“闻潞布(黄陂产),广东安徽商人,多买收之”。^⑭棉花运销与土布类似,由花贩子在农村收集,再由棉商贩运至武汉,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9—30页。

② 周成均主编:《沔阳纺织志》,湖北省沔阳县纺织工业公司1987年印行,第4页。

③ 万历《湖广总志》卷35《风俗》,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第17页。

④ 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2页。

⑤ 民国《湖北通志》卷21《风俗》,民国十年(1921)刻本,第32页。

⑥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⑦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2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⑧ 同治《监利县志》卷8《风土志序》,同治十一年刻本,第1页。

⑨ 同治《枝江县志》卷7《赋役下·物产》,同治五年刊本,第15页。

⑩ 乾隆《汉阳县志》卷6《城池》,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第168页。

⑪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页。

⑫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十五·仓储下》,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991页。

⑬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78页。

⑭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78页。

继而转运至消费市场,除专种棉花的州县外,湖北其余地方棉花产量不高。^①湖北乡村的棉花、土布依托专业市镇的花布行与区域外市场发生了联系,形成了乡村—市镇—转运市场—消费市场的生产流通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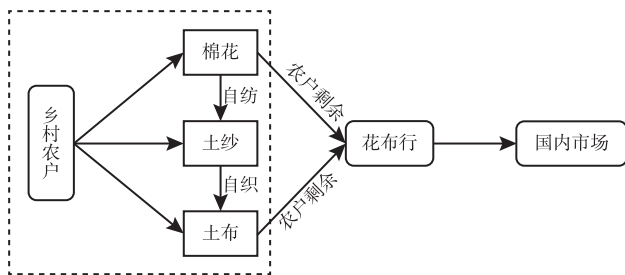


图4 武汉传统棉业基本形态

武汉及其周围地区的传统棉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原棉种植和手工纺织在家庭内部得到了充分融合,乡村家庭内部形成了植棉—纺纱—织布一体化的模式,具体形态如图4所示。传统棉业的专业化程度很低,未出现明显分工,呈现出“棉纺结合”“纺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特征。在流通领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棉纺织市镇,承担起连接乡村与区域外市场的桥梁作用,但市镇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市镇的棉产品依赖于乡村的供给。传统上,武汉棉业最为基本的生产环节是农户,最为重要的销售环节是市镇的花布行,“农户—花布行”形成了棉布业的基本产销模式,产业结构简单、链条短是其主要特点。

(二) 近代武汉棉业市场城乡供需双向驱动的形成

1861年的汉口开埠使得湖北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之一,其传统的棉纺织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侵蚀了大部分土纱、土布的市场。^②但这一冲击对于土纱和土布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土纱被洋纱排挤的程度远高于土布被洋布的排挤,换言之,在武汉的消费市场上,洋纱比洋布更受欢迎。

为了抵御洋纱、洋布倾销所造成的大量利源外流,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开始兴办新式棉纺织工业。^③张之洞在《拟设织布局折》中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④在“开源塞卮”和“扩保利权”这两大目标的激励下,张之洞的办厂决心异常坚决,最终克服种种困难,使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顺利建成投产。民元以后,民族工商业开始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武汉的工业企业也获利颇丰,社会各界资本纷纷转向工业投资,其中发展最快的纺织业更是成为了投资热点。在此期间,武汉兴建了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泰安纱厂5家近代纱厂,与原有的织布、纺纱官局一起构成了武汉的近代棉纺织工业体系。

表1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

厂名	建成投产时间	地址	开工时生产规模
湖北织布官局	1892年	武昌文昌门外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湖北纺纱官局	1897年	武昌文昌门外	纱锭50064枚

① 王兆麟:《武汉的棉花行》,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文史资料》第6辑,1982年印行,第167—168页。

② 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第42页。

③ 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第53页。

④ 《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许同莘等编:《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6,北平文华斋1928年版,第6—

续表 1

厂名	建成投产时间	地址	开工时生产规模
第一纱厂	1919年	武昌武胜门外	纱锭 44000 枚,布机 500 台
裕华纱厂	1922年	武昌上新河	纱锭 30396 枚,布机 400 台
震寰纱厂	1922年	武昌上新河	纱锭 26000 枚,布机 250 台
申新第四纱厂	1922年	汉口宗关	纱锭 14784 枚
泰安纱厂	1924年	汉口宗关	纱锭 20330 枚,布机 200 台

资料来源: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纱官局的数据引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武汉市志·工业志》第 608 页,第一纱厂、震寰纱厂、申新第四纱厂的数据引自徐鹏航主编的《湖北工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5—127 页,裕华纱厂的数据引自《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写组编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 页,泰安纱厂的数据引自《湖北省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纺织工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 页。

表 1 反映了晚清至民国武汉近代纱厂的建成投产时间、创办地址以及开工时的生产规模。除了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于晚清建成外,其余 5 家纱厂均是在 1919—1924 年兴建的。不难看出,武汉的这几家大型纱厂大多设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都是官办企业,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将工厂设在行政机构所在地武昌。而之后的一纱、裕华、震寰等设厂选址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因素,纺织工厂占地面积大,很难在汉口找到足够大的地皮,而当时武昌的地价远比汉口低。武昌沿江地带靠近码头,方便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于是便成为了纱厂的最佳选址。唯一设在汉口的民族资本纱厂是申新第四纱厂,其创设初衷就是给同属荣氏企业的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提供面粉袋,设在汉口利于其统一管理。而泰安纱厂属于日资企业,工厂设在汉口日本租界内。几个大型纱厂在武昌、汉口两地相继开办,形成了武汉纺织工业的基本布局。

以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的建立为开端,武汉棉业开始走向了产业化发展之路。民营纱厂的兴建夺回了民族工业在棉纺织产品市场的主导权,有力反击了外国产品的倾销。城市工业的效应扩散到了乡村,原本以“自纺自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出现了广泛的“纺织分离”现象,农户的植棉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城市纱厂与乡村棉纺织业之间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供求关系:(1)湖北广大乡村为武汉新式纱厂提供了充足的棉花,武汉纱厂成为湖北棉花主要需求方之一;(2)新式纱厂为乡村棉织业提供了机纱这种新型原料,乡村棉织业成为支持新式纱厂成长的重要市场;(3)随着城市机纱这一廉价原材料的大量使用,乡村土布在生产、产品质量方面得到了改良,土布的产量迅速增长,同时适宜的价格增加了城乡广大居民的需求,其销售区域得到进一步拓宽。

在城市中,随着一战后民营纱厂的兴建,武汉的纱锭数由 1892 年的 30440 枚猛增至 1922 年的 153440 枚。^① 棉纺工业的蓬勃兴起,导致了武汉棉花消费量的逐年增加。图 5 展示的是 1920—1936 年武汉各大纱厂总用棉量,可以看出,棉花消费量在这一时段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顶峰大约在 1929—1932 年。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武汉棉纺工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棉花消费量呈直线增长态势,由 1920 年的 38000 担增至 1925 年的 556983 担。^② 不过从 1926 年开始,情况有所改变,接连两年棉花消费量下降,1927 年更是不足 3 万担。其主要原因与当时的罢工运动有关。^③ 但此后便迅速恢复生产。总的来看,1929—1932 年是武汉纱厂的兴盛期,据武汉商品检验处报告,1932 年武汉纱厂用花量有 694300 担。^④

武汉纱厂所需棉花主要来源于本省,“本市(武汉)纱厂所销棉花,大都系本省所产,陕西、河南之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 668 页。

②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2 辑,第 67 页。

③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写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 91、97 页。

④ 周春崖:《二十二年湖北经济的回顾》,《中国经济评论》第 1 卷第 3 期(1934 年)。

花,采用不多,美棉印棉,采用尤少”。^①只有当本省棉质量不佳时,武汉各大纱厂才会考虑使用美棉,“在汉口之裕华、第一、民生、震寰、泰安(泰安、震寰目下休业中)等五纺织厂,锭数有二十二万五千锭,每年棉花消费额达五、六十万担,大都使用各地产棉之优良品,如土产棉不良之时,则加用美棉。”^②申新四厂在1931年使用本国棉的占比为62%,1932年接近80%,美国棉的使用比例则不足20%,^③这也说明,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国外棉花输入增多的情况下,以申新四厂为代表的武汉纱厂还是以使用国产棉花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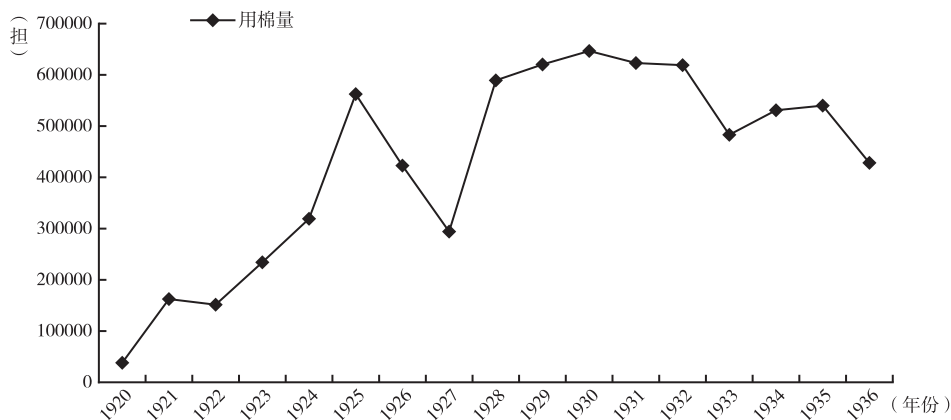


图5 1920年至1936年武汉纱厂用棉量

资料来源:据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2辑第67页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1925年、1927年未包括泰安纱厂已开工纱锭用棉量。1933年未包括申新纱厂开工纱锭用棉量。

如此巨大的棉花需求量扩张了汉口的棉花市场,而棉价的急剧提高更是掀起了湖北各地乡村种植棉花的潮流。“十年以前,湖北棉花出口无多,农家植棉,率以供给本地销路为度。今年棉花出口日多,大利所在,农家多以稻田、旱田改种棉花,从前素不产棉之地,亦以产棉闻矣。”^④民国以前,鄂省各府“丰年每亩收花百数十斤,中岁收百斤,歉岁五六十斤。其产额之占多数者,则为汉属襄河内之里河一带,岁收约六十余万石,黄属东西两河产棉五十余万石,武昌、安陆、德安、荆州等属产棉三四十万石,统计湖北产花之数百五六十万石”;^⑤民国时期湖北棉花年产量逐渐超过200万担,到了1922年,湖北省内棉田面积已达761.2万亩,皮棉产量202.9万担,湖北成为国内棉花产量仅次于江苏的产棉大省;在棉产量最高的1928年,湖北省的棉田面积已经超过千万亩,皮棉产量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63.7万担,一下跃居全国第一位。^⑥

棉纺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致使大量棉花从手纺车上转移出来,大大提升了棉花的商品化率,扩大了其贸易规模。湖北省所产的棉花基本先集中到汉口,1933年前后有五六十万担销于本市纱厂,其余则运输出口。^⑦1936—1937年前后新花上市季节,每日棉花成交量最高达5000—6000担,平均为3000—4000担。武汉市各棉纺织厂平均每月购棉花25000担左右,占市场销棉盘的

①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45页。

② 《湖北棉花生产及交易状况》,《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6期(1933年)。

③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648页。

④ 《湖北省之烟草》,《中外经济周刊》第110期(1925年)。

⑤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2页。

⑥ 徐凯希:《近代湖北植棉业初探》,《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⑦ 鲍幼申编:《湖北省经济概况》,《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7期(1934年)。

14%，其余均运销上海，少数粗绒运销重庆、昆明等地。^①从图1也可以看出，1891—1923年的江汉关棉花进口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棉花的出口量自一战后有了大幅度提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从陕西、河南、山西、湖南运汉的。可以说武汉棉纺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湖北广大乡村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而植棉业的迅速扩张又给武汉纱厂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给保障。

城市棉纺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植棉业的发展，湖北很多地区的种植结构也开始调整，植棉面积不断扩张，棉花在农作物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出现了很多专业种植棉花的地区，如随县、江陵、沔阳等县，年产量均超过10万担。^②植棉与家庭手工业逐渐分割开来，成为一个专业的产业部门，而与城市纺织工业更密切地进行联动。

机纱之所以能取代土纱，主要原因在于其低廉的价格使得农户能获得更高的收益。湖北棉纺织业在引进新技术后，出现了专业化分工。清末以前，购买土纱织布的价格过高，农村家庭一般选择自纺自织。开埠后，织户开始购买价格相对低廉的洋纱织布，但由于洋纱不够坚韧，不符合乡村手工业的使用习惯，一开始不被织户和布行接受。武汉纱厂设立后，由于技术比较落后，只能生产14支或16支的偏中低端的棉纱，但使用这种低支棉纱所织成的土布更接近传统土布的品质，受到了湖北农民的欢迎。^③根据美代清彦对鄂西北所做的农业调查，手工纺纱“一日出细纱二三两，纺一斤之纱需五日。纱价，细者每两十九文，粗者十六文，一斤细纱三百四文，粗纱二百五十六文。而上等棉花，一斤二百文，下等百六十文。纺纱一斤之工钱百零四文，或九十六文。一日之工钱，仅十九文或二十一文”，而织布则“每日织一匹，长三丈三尺，重二斤四两者，价四百文。棉价二百八十八文，余百十二文，即一日之工钱也”。^④纺纱一天的收益是20文左右，而织布一天的收益是112文，后者几乎是前者的6倍。国产机纺纱的普及将织户从低效、低利润的手工纺纱劳动中解放出来，致使湖北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购买机纱织布的专业织户，造成了进一步的纺织分离。

纺织分离意味着很多地区的农户不再进行手纺纱这一工序，越来越多的湖北农民用机纱代替手纺纱织造土布，这一现象在武汉附近乡村地区更为明显。在武昌，原本是“旧法纱织业最盛之地”，但由于当地纱厂出品的机纱盛行，其周围乡村“农妇之旧法纺纱遂渐归淘汰”。^⑤在枝江，出现了一些常年织布户，他们“从集镇买回棉纱，织成土布，拿到董市、白洋等地布庄出卖”。^⑥在新堤镇，武汉裕华纱厂的机纱销路甚好，“除农户纺纱织布外，专业织户多用洋纱，尤愿用裕华的‘双鸡’和‘赛马’纱，年销售千件”。^⑦樊城每年也从武汉的裕华、申四和泰安纱厂大量进口棉纱，用以织布、袜和毛巾等。^⑧在猗亭，机纺的“荆州牌”“喜鹊牌”棉纱天天由沙宜班轮运来，然后由码头工人抬到各布庄，并形成手织机与脚踏机并用，土棉布、洋经棉纬布、纱庄（洋纱）布齐产的格局。^⑨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新式纱厂凭借其机器生产的棉纱逐步在乡村地区站稳了脚跟，机纱织布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纺织分离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武汉的机纱供给对于早期的乡村织布需求来说是充足的，从表2可以看出，武汉的机纱产量整体保持增长趋势。尤其是1928年，机纱产量达到了50741.47吨，猛增的机纱为发展迟滞的乡村手工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648页。

② 徐凯希：《近代湖北植棉业初探》，《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③ 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第65页。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242页。

⑤ 国民政府立法院：《武汉工厂调查》（1929—1930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档号04—023。

⑥ 张东铭：《对解放前安福寺一带农村经济的回顾》，枝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印行，第71页。

⑦ 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⑧ 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编印：《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乙篇《樊城经济调查报告》，1937年印行，第34页。

⑨ 冯长菁：《猗亭纺织今昔谈》，枝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第90页。

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又由表 3 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在民国的最初几年,日本纱占据了优势地位,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武汉机纱扭转。由于武汉距离宜昌、沙市等省内口岸较近,运输费用、厘金、捐税等方面的支出相对更少,且宜昌、沙市是武汉的腹地市场,商业往来密切,具有天然的路径依赖。因此,武汉纱很快在沙市市场上跃居第一位,占比由 1913 年的 3.25% 增加至 1919 年的 77.15%。“宜昌、沙市居湖北上游。上海、汉口棉纱,由此分运到荆州、施南、鹤峰、宜昌等属,年约五六万担。其中本国纱厂最多,汉口纱尤占多数。”^①这也说明了以武汉纱为首的国产纱在湖北各口岸以及乡村的大规模销售情形。

表 2 1916—1928 年部分年份武汉机纱产量 单位:吨

年份	全省总计	纱、布局	一纱	裕华	震寰	申四	泰安
1916	8429.61	8429.61	—	—	—	—	—
1921	6651.41	4354.56	2296.85	—	—	—	—
1923	16580.19	5747.46	825.00	4388.97	4162.55	1514.88	—
1928	50741.47	9851.23	25355.59	4490.20	3669.99	3180.15	4194.30

资料来源:据《湖北省纺织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纺织工业志》第 47 页相关内容整理。

表 3 1912—1919 年沙市日纱、汉口纱、上海纱的占比情况

年份	日本纱		汉口纱		上海纱		合计
	数量(担)	占比(%)	数量(担)	占比(%)	数量(担)	占比(%)	数量(担)
1913	47155	96.75	1584	3.25	—	—	48739
1914	45865	94.67	2581	5.33	—	—	48446
1915	47889	99.05	333	0.69	124	0.26	48346
1916	43886	98.45	626	1.40	63	0.14	44575
1917	32802	82.08	6695	16.75	468	1.17	39965
1918	25288	79.35	6339	19.89	241	0.76	31868
1919	6941	17.08	31345	77.15	2341	5.76	40627

资料来源:据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1 辑第 117 页相关内容整理。

武汉机器纺纱业的兴起对传统乡村手工纺纱环节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机纱也降低了手工织布的成本。一些农户抓住机遇,实现了快速转型,成为了专业织户,这导致乡村吸纳机纱的能力大大增强,成为城市机纱的主要市场。至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花纱对流越来越频繁。

在乡村手纺纱被大量替代的同时,乡村的手织业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改良土布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外市场。乡村织布业通过大量使用机纱降低了生产成本,出现了很多购买机纱织布的专门化生产者。比如荆沙乡间有很多农户放弃了纺纱,在 20 世纪初年,使用洋纱织布者增多,“各乡织布,其业逐年增进”,“然今年其经纬纱,共用洋棉纱”,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每年向荆沙地区大批输入棉纱。^②乡间土布通过改变原材料逆转了快被市场淘汰的命运,且一度凭借价格优势胜过了武汉纱厂所织造的机布,“乡间木机所织土布较厂(织)布为廉,厂布无论粗细,不及土布之畅销”。^③这也导致震寰纱厂在经历 20 世纪 30 年代的行业危机后,决定复工时不再织布而专纺 16 支纱。从表 4 可以看到,直到抗战前,湖北乡村手织业依然坚挺,其产量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其销售区域则延续了清末的格局,除了本省消费量较大以外,陕西、甘肃、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均是其广阔的区域外市场。因此,可以说,通过城市机纱的输入,乡村手织业与传统纺纱业分离,从而造成了传统土布的革新,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

① 陈重民:《今世中国贸易通志》,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2—23 页。

② 徐凯希:《近代荆沙经济的演变及其特征》,荆沙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荆沙文史资料》,1996 年印行,第 19 页。

③ 《震寰纺织公司复工计划书》(1935 年),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 114-1-77。

表 4

1937年湖北各地土布生产及销售情况

地名	出产季节	运销量	销行地带
金口	全年	50000 匹	嘉鱼、牌州
鄂城	秋	约 5000 公斤	江西、安徽
葛店	全年	260000 匹	汉口
黄石港	全年	188000 匹	江西玉山
花园	春秋	20000 匹	陕西、甘肃
岳家口	全年	90000 匹	汉口
老河口	秋	20000 匹	陕西、汉中、汉南
长江埠	全年	700000 匹	长江下游
应山	全年	100000 匹	河南
阳逻	全年	400000 匹	汉口、怀宁
仓子埠	秋	45000 公斤	贵州、洪江
新洲	全年	80000 卷	鄂西、湖南、陕西、四川
浠水	全年	2000000 匹	皖休宁、屯溪
广济	春秋冬	10000 匹	武穴、圻春、阳新、九江
枝江	全年	160000 尺	沙市、汉口
河溶	全年	40000 匹	远安、郝埠、徐家棚
江口	全年	300000 匹	东川
董市	全年	600000 匹	兴山、归州巴东

资料来源:据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84、85页相关内容整理。

随着土布产量的增多,乡村与城市通过土布的收集与加工进一步加深了联系。棉纺织品的制造包括基本步骤和整理步骤,前者有清花、梳棉、棉条、粗纱、细纱及织布等诸项工序,后者有漂白、染色、印花及整理等项工序。^① 由农户织成的布只是白坯布,布店收购后,让有经验的店员“看布”,即判定每种布适宜染的颜色和用途,之后便送到染坊染色,染色后的色布才能出售给消费者。^②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武汉的印染业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机染厂和染坊并存的局面,机染厂有隆昌、福兴、东华、茂记,大型染坊有善昌染坊和美昌染坊,小型染坊有和记、华中、达昌、保记、义生昌等户。^③ 这些印染行业的兴起为土布的商品化提供了专业的加工,拉长了棉纺织品的生产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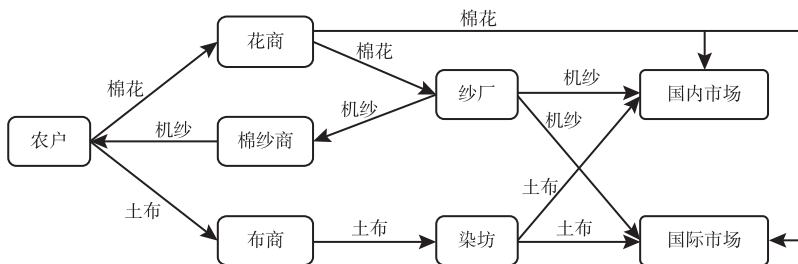


图 6 近代武汉棉业产业链基本形态

随着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产业联动更加密切,具体产业链形态如图6所示。随着纱厂用棉量的增大,农村种植棉花的面积急速扩张,出现了很多专业植棉、产棉的区域,原先纺纱与织布结合的家庭内部生产制度遭到了破坏;广大乡村也成为了城市机纱的主要市场,纺织分离是

①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92页。

② 胡柱云口述,夏循海整理:《旧时荆沙的土布业》,沙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沙市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印行,第239—240页。

③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679页。

因为城乡市场的供求双向驱动造成专业化分工;乡村土布在此过程中顺利完成了改良,并稳固了原有的市场地位,并向其他地区扩散,同时城市印染业的发展也延伸和完善了城乡棉业的生产链。农村中棉花、土布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专业化生产的趋势扩大,农村和城市在原料市场、产品市场上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在棉业方面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城乡供需双向驱动模式。

三、近代武汉棉业发展的原因探析

近代武汉传统棉业在开埠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以应对西方棉纺工业品大量涌入的冲击。在城市,作为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代表,棉纺织工业因本土供求市场的变化出现了更多的新式纺纱厂;在乡村则主要体现为引进城市的机纺纱,只从事织布,农业专业化生产趋势扩大。城市与乡村供求的驱动力增强,棉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链,整个产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原料和技术革新的推动以及商人对技术扩散和城乡之间棉产品的运输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 原料和技术的革新

原本湖北所产的棉花质地粗壮坚韧,非常适合对棉花品质要求不高的土纱,但同时也因为花瓣细小、纤维粗短而难以满足工厂机器纺纱的需要。为了保障武汉新式纱厂的原料供给,湖北地方政府和棉纺织业专业人士推动了数次棉业改良运动,这对于武汉市场上棉花产量和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后,推行了首次鄂棉改良。他先是饬令云梦、安陆等州县种植上海、通州的棉种,后又引进美棉,分发给各州县试种,约定种成之后由湖北织布官局从优给价收买。^① 民国时期,政府颁布了植棉奖励条例,武昌、荆州和钟祥都曾设立棉业试验场。此后,由于战乱频发、棉田缺乏管理,农民的种植方法亦不甚科学,棉种出现了严重退化。加上1931年长江流域的洪灾和汉口棉花市场掺水掺杂的恶习横行,鄂棉质量受到质疑,棉花品质的降低对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应对湖北棉花行业的危机,1930年武汉棉纺织业专业人士联合政府和高等院校成立了棉业改良委员会,又推行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棉产改进运动。该委员会在武汉的珞珈山、汉口博学中学、徐家棚、武丰林园和沙市广设试验场进行棉作实验,又在老河口、随县、钟祥、孝感等地建立试验区,实现了棉业技术改进和良种推广;同时打击棉花掺假作伪行为、争取减免棉花税额、创办机器轧花打包厂,全方位改善棉花市场交易环境。^②

在政府、实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湖北省棉花产量和质量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从产量方面来衡量,湖北成为国内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③ 据《鄂棉产销研究》统计,1919—1936年,湖北棉田面积有3年居全国第一位,总产量有4年居全国第一位,棉田面积和棉花产量大致在全国居第二位。^④ 在质量方面,湖北棉花也有了巨大的进步,成功取代了印度棉,成为上海、苏州、汉口、宁波等地纱厂的主要供给原料之一。^⑤ 植棉事业的兴盛为湖北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原料保障,是其得以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

近代纱厂是纺织技术革新的微观主体,在生产技术的变革和新科技的引进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1893年,湖北织布官局从英国购买了纱机30000锭、布机1000台,并聘请外国技工来鄂指导。湖北织布官局是湖北第一家综合性大型棉纺织企业,在最初几年,“布局纺纱织布逐日增加,现开夜

① 徐凯希:《张之洞与近代鄂棉改良》,《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

② 王兆宁:《湖北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第36、41页。

③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648页。

④ 梁庆椿等编著:《鄂棉产销研究》,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年印行,第393页。

⑤ 梅莉:《历史时期湖北的植棉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工出货尤多,市面销售甚畅,他省商贩来局订购纱布者,亦陆续不绝”。^①之后,随着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等华商纱厂的兴起,加上原有的织布、纺纱官局和日商兴建的泰安纱厂,武汉的城市棉纺织工业体系基本形成。纱锭数由1911年的78910枚增至1936年的322192枚,普通布机由1911年的475台增至1936年的3000台,自动布机由1936年的1000台增至4205台。^②现代纺织机器的引入提高了纺纱和织布的效率,实现了机纱的大规模生产,为机纱在广大乡村的普及打下了基础。

城市工业对乡村织布业产生了技术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新型织布机的供给方面。新型织布机主要分为3种:手拉织机(拉梭机)、脚踏铁木机(铁轮机)、铁机。其中,铁轮机效率比拉梭机至少高1倍。^③在湖北,一些乡村和城镇使用的“洋机”主要是指脚踏铁木机,实际上是土洋结合的改造品,“其机架仍是木制,有一个大铁盘,又配有大小铁齿轮盘,木架中心横贯铁梁,大铁盘用皮带带动大小齿轮,脚踩踏板,大小轮盘转动,可以自动投梭。每人每天可织布3匹,且宽窄一致,长短整齐”。^④而旧式织机则效率低下,如枝江安福寺使用纯木制“手(织)机”的织户,脚踩手推,熟手1天也只能织3丈2尺的布1匹,^⑤沔阳县在1912年以前使用木制小织布机的织户每天生产12小时,只能产土布10米左右。^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乡村织户逐渐使用铁木机,其比传统的木机效率高出许多,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比如沔阳彭场织布湾的织布户朱复之在1926年从外地购回铁木混合织机两台,对该县棉织业的织机改良起到了推动作用,后来全县大部分织户换上了铁木混合织机,截止1941年,该县拥有铁木混合织机110台,年产棉布110000米,大大提高了土布产量。^⑦

中心城市武汉和一些地方城市也兴办了织布机制造工厂,这为广大乡村地区更新自家的生产工具提供了保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武汉工商业调查报告中,汉口润新机器工厂业务范围就涉及“织布铁机类”。^⑧宜昌的李正顺机器厂,通过向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学习砂型铸造的基本技能,在1915至1920年生产最旺时,每年平均要生产2000多台织布机,销往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各地。^⑨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改良织布机的比例提升,进而增强了乡村的织布能力,使之能够消纳城市大型机器所生产的大规模机纱,这是促进纺织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 商人的中介作用

在近代武汉与其腹地农村进行棉业市场供求互动的过程中,商人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商人只有充分了解实地的消费需求与产品的供给价格,才能获得利润。各乡县的本土商人发挥了技术扩散的中介功能,棉花、棉纱、土布贩运商则起到了运输和沟通的作用。本地商人在推动乡村地区棉纺织技术改造升级的作用中至关重要,而贩运商则提高了城市和乡村的互动频率与效率。

在湖北机纺纱普及之后,湖北一些县域的本地商人抓住了机纱价格低廉的优势,首先开始采取用机纱替代传统土纱进行规模化生产,而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前提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具有革新意

① 张之洞:《札北藩司借拨布局银七八万两以应急需》,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9页。

②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工业志》,第635页。1911年的纱锭数来自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800—2012)》,第73页。

③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632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410页。

④ 王子观:《吴正之改进织布机》,枝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印行,第118—119页。

⑤ 张东铭:《对解放前安福寺一带农村经济的回顾》,枝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第71页。

⑥ 周成均主编:《沔阳纺织志》,湖北省沔阳县纺织工业公司1987年印行,第28页。

⑦ 周成均主编:《沔阳纺织志》,第23页。

⑧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著:《武汉之工商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2年版,第90页。

⑨ 杨燮诚:《宜昌最早的机器厂李正顺》,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宜昌市文史资料》第9辑,1988年印行,第1—6页。

识的商人从外地购进生产效率更高的铁木机进行生产。在荆沙,民国初年,商人来敬臣购进高脚织机 60 余台,与布商合股开办“西亚”“协合”等三家织布作坊;之后,吴子敬进口日本织布铁机 28 部,用蒸汽带动,兴办云锦机器织布厂,成为荆沙棉织业机器生产的开端。^①而在沔阳,在织布户朱复之的影响下,铁木机由 1926 年的两台迅速增加至 1942 年的 110 台。^②商人购进新型织布机的行为对当地其他织布户和农户产生了示范效应,促进了新型织布机在当地的传播和扩散,起到了技术扩散的作用。

在本地商人的主持和带领下,一些地区兴建了小型织布厂。在钟祥县,1918 年,商人韩善甫购回铁木结构织布机 36 台,在县城文昌阁开办醒华织布厂,生产白细棉布。^③在宜昌,1921 年,高宏坤创办了高万顺机坊,到 1927 年该厂共有 20 台布机、近 30 名工人,到 1932 年该厂布机增至 40 余台,员工超过百人,年产棉布 2.4 万匹—3 万匹。^④小型织布厂的兴建,使得一些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专业的织布生产活动,提高了土布的商品化率,促进了当地棉纺织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此外,一些商人给周围农户提供机纱,聘请农户为其代加工棉布,等棉布加工完成之后再付佣金。在黄冈县回龙山,林庆甫所办工厂有铁木混合机 16 台,除雇用工人 20 多人外,还发纱给附近 28 家机户加工棉布。^⑤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户由于资金匮乏而负担不起生产资料的困境,还为商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双方实现了共赢。

在长途贩运商中,棉商在运输棉花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棉花自产地运至汉口市场的流通渠道和环节为:在汉口周围的产地,棉农有一台或二三台旧式脚踏轧花机,或有日本中桐洋行的轧花机,^⑥他们将皮棉或者籽棉售与花贩。^⑦花贩将其售予产地的花行,花行将收购的籽棉轧成皮棉,再和收购的皮棉混合,装成 150 斤至 180 斤的花包。^⑧之后,由汉口本地及外省花商与产地花行进行洽谈,谈妥后花商就雇船向汉口装运。这里的花商也被称为花号,他们“从原产地批进棉花,售于汉口之需要棉花者或出口商人,尚有于汉口、沙市经花行之手而购进棉花运往上海,或设分号于原产地买进棉花运至上海”。^⑨总结来说,花号是从事长途贩运的棉商,将棉花从产地运至汉口。棉花运抵汉口后,若不能直接找到买主,会先被存放至相关的货栈。^⑩之后,由花行^⑪向卖客提取货样,代其兜售,如果买方觉得满意的话,“则至货栈勘验实货,磋验价格,然后双方订立买卖单据,由卖客移交栈单,以为成交手续”。^⑫汉口的棉花买方主要有本地纱厂、从事出口业的华商(主要向上海等其他省份出口)、洋商(主要向日本等国外市场出口)。其中,本地纱厂每年大约消费 70 余万担棉花。^⑬这是棉花最普遍的一种流通方式。此外,汉口也有大量的花厂,花厂从花号手中购进籽棉,再轧成皮棉

① 徐凯希:《近代荆沙经济的演变及其特征》,荆沙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荆沙文史资料》,第 19 页。

② 周成均主编:《沔阳纺织志》,第 28 页。

③ 湖北省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钟祥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2 页。

④ 江海波:《高万顺织布厂》,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宜昌市文史资料》第 9 辑,第 38—39 页。

⑤ 黄冈县志编纂委员会:《黄冈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1—172 页。

⑥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1 辑,第 56 页。

⑦ 梁之军:《湖北之棉业(续)》,《中国经济评论》第 2 卷第 8 期(1935 年)。

⑧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1 辑,第 56 页。

⑨ 《湖北棉花生产及交易状况》,《工商半月刊》第 5 卷第 16 期(1933 年)。

⑩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1 辑,第 56 页。

⑪ 花行有在原产地者,亦有在汉口沙市等地者。其性质略有不同,两者俱为棉花买卖之掮客,概以佣钱为目的。其中亦有依自己之意而买进棉花运往外埠者。原产地花行则受花号之委托,从花贩子买进棉花,目的在于获佣钱;都市之花行则以花号购自原产地之棉花,兜售于需要者或出口商,或介绍花号与花号间之买卖,借以获得佣金。《湖北棉花生产及交易状况》,《工商半月刊》第 5 卷第 16 期(1933 年)。

⑫ 《汉口棉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 1 卷第 13 期(1929 年)。

⑬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 1 辑,第 67 页。

出售,但这种方式也需要花行在买卖双方之间从事介绍业务。^①

棉纱商则为农户购买机纱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最初,随着洋纱的倾销,市场需求逐渐旺盛,许多兼营棉纱的摊点陆续改为专营棉纱的商号。^② 由于洋行卖纱是成件(每件40捆)出售,他们并不直接卖给本地和外县农村用户,而这些用户一次也买不起整件,只能向纱号零星购买。也有些外地客商是买整件纱的,但洋行并不直接卖给他们,因此,无论是本地用户或外地客商都要通过纱号来购买,这也导致了汉口纱商业的繁荣。^③ 棉纱商的经营方式是整进零销,做零售业务的是将整件拆捆零销;专营批发的虽不零售,但还是整批购进,按件出售,本质上还是整进零销。裕华、第一、申新、震寰以及日商泰安纱厂产的纱几乎全部卖给汉口纱号销售,厂方为了争取纱号多销,往往给予纱号优待条件,比如按售价九九扣(即按扣回1%)付款,用半个月期的钱庄庄票出货,如以现款出货,则扣回一分二厘息金等。^④

布商则承担着将乡村土布贩运至市场的重要作用。沙市有华中最大的土布市场,“商人在市场上收购个体织户的布,整装后再转卖给零售商或装船输出。棉布交易市场每天早晨开始。土布大部分输往四川,其中又有一大部分从重庆转运去云南、贵州和广东。输川的土布都是纯白的,而出口到云贵、广东的布大抵都要染色。”^⑤在荆州,城南门外的“大布场”是土布最为集中的地方,农民所织土布大多在这里出售,由“行户”在机户和贩户、布店中间进行介绍,促成交易。^⑥以黄安、麻城、黄冈三县商人为骨干的“黄帮”是实力较为雄厚的商帮,从事土布贩运的贸易。

一些资力雄厚的本地商人为本土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与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他们率先使用机纱,将新的技术传入当地农村,促进了乡村手工业自发完成转型,同时,小型织布厂的兴建也带动了当地商品化土布的规模化生产。棉商、棉纱商、布商等贩运商活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乡村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工厂、消费者之间的重要中介。如果没有这些商人的活动,棉产品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不会如此迅速。可以说,这三种商人在为城市工厂和农村手工业购买原料、城乡消费者购买产品等方面,起到了有益作用。他们是整个地区城乡之间进行产业联动的鲜活血液。

四、结论

19世纪以来,随着棉业贸易的不断发展,武汉地区棉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升级成为当地最早具有完整形态的近代产业。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企业中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包括: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而事实表明,近代武汉的棉业已经出现了本土化的改良升级。武汉棉业经历了从前期的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横跨农业和手工业的传统模式到后期的植棉、纺纱、织布分离,横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城乡供需双向驱动模式,实质上是产业改造升级的表现。通过棉业生产,农业、手工业和工业产生了密切联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动也趋于频繁。城市工业化生产推动了乡村机纺纱的普及,并为一些乡村手工业(如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提供了改良途径,促使其商品化程度提高。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并没有造成本地棉产品市场的萎缩,反而倒逼近代武汉地区及其腹地的本土化产业改造升级,使得城乡之间的产业联动性进一步加强,近代武汉地区棉业与城市早期工业化交互发展、城乡市场互为补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代表了上海等大城市之外,没有大资本工业生产投资

①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64页。

② 周新民、程霖轩:《武汉棉纱商业之兴衰》,武汉市政协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1983年印刷,第12—13页。

③ 周新民、程霖轩:《武汉棉纱商业之兴衰》,武汉市政协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第14页。

④ 周新民、程霖轩:《武汉棉纱商业之兴衰》,武汉市政协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第17页。

⑤ 李开进:《清末民初“洋人”谈沙市》,荆沙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荆沙文史资料》,第33页。

⑥ 胡柱云口述,夏循海整理:《旧时荆沙的土布业》,沙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沙市文史资料》第5辑,第239页。

的、由城乡供需双向驱动的中部产业改造升级模式,其以武汉为中心,一直拓展到长江中上游的广袤内陆地带。

笔者认为该模式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本地居民对本土产品有着天然的、略带固执的消费偏好,土布相比于洋布具有“实用、耐久、利用”的优点,至20世纪初,汉口四乡居民仍采用自织土布作为主要的服装原料。^①第二,政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工艺和技术,同时对棉种加以改良,使其达到当地纱厂机器纺纱的标准。随着武汉新型纱厂的兴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城带乡、城乡供需互动的棉业体系。第三,本地商人在城乡产业互动与升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地商人在乡间推广改良织布机、兴办小型织布工厂,改进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的织布厂工人,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机器生产有二要件:一为生产量要多;二为贩卖路要广”。^②本土商人推动了区域间的棉货贩运,避免了供过于求的现象,使得各地的棉货价格维持在平衡状态,生产力与消费能力同步增长。在武汉及其腹地,原本以耕织结合为主的传统棉纺织体系得到了改造升级,形成了乡村植棉、城市纺纱、乡村织布的专业化分工合作格局。

在这一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区域位置有着重要影响。与上海相比,武汉的棉纺织工业相对缺乏大规模的投资,发展较慢,但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武汉的棉纺织工业起步相对较早。这与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在近代的对外贸易中,起着二传手的作用。而上海作为第一批开埠的城市,是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前哨。^③武汉与本省其他县域以及长江上、中、下游的很多城市有着长期的商业往来,辐射范围较广,使其能将产业影响传播至其他中小城市。虽然纺纱工业局限于武汉,但棉花的种植、机纱织布现象却几乎遍布湖北全省,而相关棉产品的销售网络更是涵盖中部、西北、西南诸多省份。武汉在对外贸易中二传手的地位导致其棉纺织工业晚于上海,但领先于其他城市,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又加快了武汉城市化和腹地乡村现代化的进程。

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对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建设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全国地理区划来看,武汉是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相较于上海等沿海城市,其辐射范围相对较窄,是一个次开放中心,但其作为长江内航中心,是贯穿东西、联结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对于近代的国内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新旧事物的交接与汇合之处,在外来贸易的冲击下,武汉及其腹地在原本的棉纺织生产流通体系上,完成了独特的改造升级。时值今日,在掌握国民消费习惯与大众消费路径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武汉仍可以发挥其内陆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加深城乡之间的市场供求驱动。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of Cotton Industry in Modern Wuhan

(1893 – 1937)

Diao Li, Tang Qian

Abstract: In the late-Qing-early-ROC perio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trade in Hankou Town, Wuhan's conne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ecame more and more close, and the Wuhan cotton industry trade pattern began to reshape under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orces. The advancement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use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cotton industry in Wuhan area from production to sales. After the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the cotton industry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①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1辑,第97页。

② 《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

③ 刁莉、樊筠茹:《九省通衢的近代汉口》,《群言》2021年第1期。

complete supply and demand system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The cotton industry presented the localization upgrade after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modern Wuhan area. The original integration of rural spinning and weaving has changed to the fine division of labor driven by supply and demand for urban and rural markets, that is,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cotton, urban spinning, and rural weaving. The original rural spinning weav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two-way division of labor and demand of the urban and rural markets, namely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cotton, urban spinning, and rural woven fabrics. Rural homespun fabric used machine yarns to improve and upgrade, further expanding the sales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uhan cotton industry, the innova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local businessmen,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ve played a huge role.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tton industry in modern times, early industrial chain relationships also appeared. Wuhan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Yangtze River Interior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econd hand” role in the modern market.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new and old things are handed down and converg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we can see that Wuhan as a modern commercial center and inland shipping hub has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Supply and Demand Two-way Drive, Cotton Industry Trade, Cotton Industr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高超群)

《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简介

东南大学历史学系李昕升副教授《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一书于202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玉米、番薯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新史料、新视野,宏观分析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本土化的全貌,微观透视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变迁个案,重点关注作物的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和变化驱动力,探讨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揭示作物生命史和人类生命史关系,是一部关联农业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的全国性经济地理专著。

该书共八章,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全面综述前人微观研究,梳理玉米、番薯在中国的地理变迁;第二部分为第二至第六章,就浙江、云南、江西、广西等研究空白区域进行攻坚;第三部分为第七、八章,在定性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制度史、理论经济史)与实证(量化历史)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再认识清至民国美洲粮食作物的影响,提出美洲粮食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博赛拉普的反马尔萨斯理论更为符合中国国情;第四部分包含结语、附录,对外来作物入华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研究理路加以探讨。该书基本厘清了学界对清至民国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影响的争议以及一些模糊认识,有助于学界更新自何炳棣以来的美洲作物史传统认知。(张志斌)